

曾朴：

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

马晓冬 著

Z E N G P U :

T R A D U C T E U R A U T E M P S

D E T R A N S I T I O N C U L T U R E L L E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曾朴：

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

马晓冬著

Z E N G P U :

T R A D U C T E U R A U T E M P S

D E T R A N S I T I O N C U L T U R E L L E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马晓冬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4881-2

I. ①曾… II. ①马… III. ①曾朴(1872~1935)—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4988 号

书 名: 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

著作责任者: 马晓冬 著

责任编辑: 初艳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881-2/I · 28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alice1979pku@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33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此书的研究曾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资助。

此书的出版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和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的资助。

在此一并致谢。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总序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写那篇东西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应国际上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消解论”,二是为愈来愈被边缘化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正名。《北京大学学报》刊发此文时附有如下“摘要”:

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学科,只要文化交流一天不停止,比较文学就没有被“消解”的理由。作为这门学科最原初的研究领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学科中的地位曾大起大落,至今仍在某些地区、某些学者中受到轻视。然而,它一直在反思中前进,它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引入了问题意识,引入了文学批评的精神。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维系着本学科的身份与根本,它过去是,今天与未来也应是本学科最基本、最主要的研究内容。

这个颇有些“檄文”味道的“摘要”,是我应编辑部要求而自拟的。我在这里重新引用它,皆因它概括了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而末尾几句,尤其点明了策划这一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的基本立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摇旗呐喊。不过,毕竟是人微言轻,虽聊胜于无,却很难有大的反响。面对外部世界热闹非凡的大环境,面对人们求新求变求大的普遍心态,面对电视台、广告牌里充斥着的“闪亮登场”“华丽转身”“震撼推出”一类的夸张表述,那些希冀被人仰视、受人推崇、轻而易举地就能占据学术制高点的种种举动就都变得不难理解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具体到中国而言,更多的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则没有这般显赫、亮丽的外表,更没有这个时代人们竞相追逐的高回报率。它要求研究者屁股坐下来,老老实实从梳理资料开始,从认真阅读文本开始,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点点滴滴地积累和建构起足以支撑一个课题研究的宽广的知识场。不仅如此,它还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批评意识,质疑现象,提出问题,探幽索微,揭示本质。这是何等清苦而寂寞的过程!在凡事都讲效率、讲性价比的当今世界,又有多少人愿意承受这般的冷清和辛劳?但我很庆幸,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

文化研究所执教的二十年时间里,有一群学生愿意与我一样,做这个一点都不“华丽”、更不“震撼”的基础性工作。这是我的幸事,更是学科的幸福事。

如今他们已成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里。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在忙碌的教学、科研、学术活动中依然没有丢弃如此需要时间、需要砥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了一群人在踏踏实实地做,在课堂上讲,在研讨会上谈,在文章中写,再去指导他们的学生……这就变成了一种既成事实。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论证和宣传,它让本学科最基础、最本质、最核心的研究方向得以发扬,得以光大,得以传承。

这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就是专为他们设计的。我希望借此平台展示他们的研究,向学界推荐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在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丰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而之所以使用了限定词“中法”,则是受我本人研究范围所限。我是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生们也就大多沿袭了此一方向。当然,如有可能,我也希望未来能推出其他双边或多边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来。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和法兰西是两个响亮且诱人的名字。这两个文化大国,各自以其璀璨的文化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彼此都对对方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又都从对方那里汲取了有益的成分来革新、滋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其生生不息。这样一部丰富、瑰丽的历史,为中法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研究对象与视角。

本丛书没有愧对这样的多姿多彩,它的选目及作者同样也异彩纷呈: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论著,都是作者们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丛书的作者既有中国人,也有法国人;他们的论文既有在北大答辩的,也有在巴黎四大答辩的,其中有一些是在中法双方导师合作指导下完成的。丛书涉及的内容不仅是中法文化、文学间双向的对话、接受、互视、互补,而且横跨了数个世纪,涵盖了整整一部中法文化交流史:从两国间文化交流滥觞的17、18世纪,直至交流已成定势、成共识的21世纪。所处理的文本则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除了戏剧、小说、诗歌外,也不乏难以归类的记游作品、报纸杂志,甚至一切可冠之以“文”的材料……同样纷繁多样的还有作者们的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形象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不一而足。而且往往在同一部著述中,又数个方向并存,彼此切换

勾连照应。

尽管有这般的千差万别,本丛书的著述仍然有着许多共通之处。首先是作者们的研究和立论都建立在第一手中西文资料的基础上。说到这一点,或许应特别指出,不管他们最终在哪里答辩,作者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都曾在中国政府或法国政府的资助下,远赴对象国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呼吸异国的精神文化空气,切身感悟异国的文化氛围。其次是所有的论著都是个案研究。这就保证了这批年轻的学者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建构起相应的知识场,尽可能地穷尽相关资料,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成果的原创性、科学性。但这些从小处入手的研究,却不乏大的抱负。我们可以看到,入选的每一本书都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文学史关怀。研究中国文学流播法国的作者,汲汲于讨论中国文化因子、元素,为何和怎样参与了法国文学的变革;处理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作者,则念念不忘探讨法国文学、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作用。一国文学,因为与异文学的相遇、交流、对话而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比较文学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作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从而也就丰富甚至改写了接受国的文学史。由此牵连出的,是作者们对变化过程的重视。而在这种对过程的描述和讨论中,文学史就必然与思想史、心态史、社会史,甚至经贸史、外交史相交叉、相关照、相联系。如此宽广的研究场域才保证了他们可以进而去探讨接受国的观念是如何在与异文化的对话、对质中渐变、革新的。不仅如此,这些年轻的比较学者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他们知道:一国文学在异国的译介、传播、接受,不仅在时间上延续了原著的艺术生命,而且在空间上也由于跨文化变异而赋予了原著以新的意义。所有这些,都必将进入我们称之为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所以说到底,他们瞄准的是书写世界文学史。

以上这些共通点,既有对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继承,更体现出了作者们对方法论变革的自觉。我在“摘要”中强调的那些最根本的变化,完全可以引这些著述为证。令人欣喜的是,作者们并没有“鹦鹉学舌”般地照搬各种新概念、新理论,而是将一切适用的东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研究中,并且以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再去补充和完善现存的理论和方法。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变革实践的参与者、亲历者,更是变革历史的建构者、书写者。这对他们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而历史——中国的、法国的、世界的比较文学历史,不是已经在变革的事实中铭记下了这些参与者、书写者们的奉献?

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作者们生平的第一本专著，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初出道者的特点：略显稚嫩，多少未脱博士论文特有的“学究味”，分析和探讨也都还有向纵深拓展的余地。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是“成长中的烦恼”。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必定会“天天向上”。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2014年是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两国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我们选择此时推出这套丛书，自然是希望沾一点欢庆的喜气，同时也为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送上我们比较学者的祝福。为了能让这套丛书按时出版，北大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张冰、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专员易杰(Nicolas Idier)及其助手张艳、本丛书责编初艳红等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了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帮助，我谨代表丛书的各位作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为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比较学者，能在古稀之年推出这样一套丛书并为之作序，实在是我此生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幸福！

是为序。

孟华

2014年10月10日写于京西

目 录

导言	1
一、走向译者	1
二、作为译者的曾朴	4
三、关于曾朴研究的课题史及本书的研究方法	6
 第一章 译者曾朴的文学道路	13
第一节 文学活动的准备:同文馆的学习和 陈季同的启蒙(1895—1903)	14
一、语言学习与救国心态	14
二、文学的转向:陈季同的启蒙	23
第二节 走上文学之路:小说林时期的文学活动 (1904—1908)	30
一、小说林社:曾朴的文学出版事业	30
二、“译”与“介”	41
第三节 重返文坛:真美善时期的文学活动 (1927—1931)	51
一、登上新文坛	52
二、《真美善》杂志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61
三、法国文化的世界	66
 第二章 翻译观念与翻译选择	77
第一节 曾朴的翻译观念	77
一、文学理想与翻译动机	77
二、“翻译是创造的肥料”	85
第二节 曾朴的翻译选择	98
一、时代风尚与个性选择	99
二、语言转型期内的翻译语体选择	121
三、译本的选择与阐释:译者对本土文学的参与	137

第三章 翻译实践:曾朴笔下的雨果	147
第一节 译介取向之转变	148
一、历史思考与现实政治	148
二、知识倾向	157
第二节 《九十三年》:在阅读与创造之间	162
一、不一样的“革命”	163
二、译者:阅读与创造	172
第三节 曾朴对雨果戏剧的译介	187
一、戏剧翻译的独特面目	189
二、翻译与改编:一部雨果剧作在中国的流传	208
第四章 翻译与写作	220
第一节 作者与译者:曾朴的文学追求	220
一、从真事实到真情感	222
二、为人生而艺术?	232
三、对“美”的推重	237
第二节 创作中的异国因素:从《孽海花》到《鲁男子》	245
一、《孽海花》中的异国因素:知识场和交游圈	245
二、作者与译者的对话:《鲁男子》的创作	254
结语	265
参考文献	272
附录一:曾朴翻译作品目录	280
附录二:曾朴著作目录	286
附录三: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曾朴日记	
手稿中的文学史料	291
附录四:《影之花》的译者问题	307
后记	313

导 言

一、走向译者

无论对中国近现代语言转型还是文学发展,域外文学的翻译与输入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贡献。对此,任何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予以否认。然而在学术话语中,尽管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具有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认可,但作为个体的译者却仍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如果说翻译的非原创本质总是遮盖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并因此使许多译者及他们的成绩被普通读者所忽略,那么包括比较学者在内的文学研究者却不应忘却或无视他们的存在。

随着翻译研究这一学科在国内学术界的日益发展壮大,十几年来已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了“译者”这一文学史上独特的群体。如王友贵先后出版的《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六位翻译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及《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等著作,代表了关注作家翻译活动的努力;白立平的《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与翻译——梁实秋翻译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4)、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马红军著《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许渊冲的译学理论与实践》(译文出版社,2006)、商瑞芹著《诗魂的再生——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严晓江著《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等著作则或从宏观或从微观的角度对某些译者的理论及实践进行了探讨;近几年又涌现出顾钧著《鲁迅翻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肖曼琼《翻译家卞之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刘云雁《朱生豪莎剧翻译——影响与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等新的译者研究成果。不过,考虑到一百多年来灿若星辰的众多翻译家的贡献,目前的研究与译者这一群体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实际价值仍是不相称的。

有论者提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应该包括这样三个基本要素:作家(翻译家和原作家)、作品(译作)和事件(不仅是文学翻译实践,还

有翻译文学作品在译入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事件)”^①,笔者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对译者具体翻译实践、翻译理念、翻译策略与其影响的考察构成了书写翻译文学史的基础。译者是建构翻译史的主体性因素。文学作品跨文化的传递与传播,异国语言模式、文化因素在译语中的移植,都有赖于译者去实现,而其具体的实现方式又取决于译者所处历史环境与个性化的主观选择。对那些在翻译史上辛勤耕耘过的译者做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个案考察无疑会使翻译史的书写一步步丰满起来。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虽然学界对个别翻译文本和翻译现象的探讨能够拓展我们对涉及其中的译者的认识^②,但对译者的整体研究,仍集中于数量相对有限的某些翻译大家,在范围上有极大的扩展空间。同时,和鲁迅、梁实秋、徐志摩、穆旦等这些著译者的创作所受到的深入关注和研究相比,对他们的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待进一步的扩展。

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 1942—1991)在其《走向翻译批评:约翰·邓恩》一书中指出,“走向译者”是一种根本的方法论的转向,他认为:“翻译阐释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將翻译主体纳入研究的视野。因此,‘谁是译者’(原文为斜体——笔者注)这个问题是我们在面对翻译时必须坚定地提出来的问题。”^③

正如作家研究是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译者研究也理应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严格说来,完整的译者研究应该包含两个部分:对作为狭义的“翻译主体”的译者与作为“历史存在”的译者的研究。在此,我们所说的对“翻译主体”的探讨主要关注译者生命中与翻译转换活动直接相关的维度:包括其语言水平、翻译观念、具体翻译策略以及在其主体性关照之下其翻译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具体面貌。而对作为“历史存在”的译者的考察则宜将视野从具体的翻译作品和翻译活动中转向译者更为完整的人生与文化历程:包括其生平经历、其他文化活动以及整体性

①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2页。

② 如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和宋学智:《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等研究无疑深化了我们对译者的认识。

③ Antoine Berman,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Gallimard, 1995, p. 73, 本文采用袁筱一、邹东来译文,见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基本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52页。

的文学与文化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译者的关注以传记式探讨与写作为主^①,勾勒译者生平、人生经历,梳理其翻译成绩及影响,为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译者的翻译活动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然而,这种局限于对作为历史存在的译者的关注却往往无法对译者具体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文本提供更为充分的描述与解释。它只在具体翻译实践的外围探测,往往因缺少对具体文本的考量而无法深入译者研究的腹地。

贝尔曼提出,“译者是谁”这个问题与“作者是谁”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目标。“作者是谁的问题指向被认为是启发了其作品的传记、心理和生平因素。”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译者的生活及其心灵状态与翻译批评则不甚相关。在此,我们很难完全认同贝尔曼对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绝对区分。我们当然承认,要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与作品提供充分的阐释,不能满足于各种生平“信息”与翻译“史实”的梳理,“而应该向前一步,确定他的翻译立场、翻译规划以及他的翻译视野。”^②也就是说,需要对作为狭义的“翻译主体”的译者给予集中的探究。这种探究的基础必定是以从原文到译文的对比分析为基础的。研究者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判断译者的翻译立场、翻译规划以及翻译视野出发点可以是译者本人的理论言说与阐述,但必须不止于此,而需从对译文的具体考察中得出结论。毕竟,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是在翻译作品中容纳和呈现自身的。

但反过来说,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又是在其“历史存在”的基础上生成的。正是为了对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转向其在历史中的存在。译者的翻译立场、规划和翻译视野都与其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也会不可避免地与其个体的人生经历与其他文化活动产生或明或暗的联系。另一方面,译者与外国文化的接触以及大量的翻译实践又会对其历史中的存在进行深刻的文化塑造,对此的探究会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翻译行为对个体文化选择、立场之影响。

当然,我们对所谓“翻译主体”和“历史存在”的区分是在方法论的阐述下作出的,在现实中这两个维度则交融在每一个个体的翻译者之中。这种区分旨在提醒我们,对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全面认识与阐释需要研

① 此类写作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高惠群、乌传袞:《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金梅:《译坛巨匠——傅雷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等。

② Antoine Berman,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Gallimard, 1995, p. 73—74. 译文为笔者提供。

究者对这两个维度给予综合的、会通性的考察。而探索译文的具体面貌、译者的翻译立场、翻译视野与译者历史存在之间的双向影响与联结，也自然成为翻译研究最富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本书的研究对象曾朴（1872—1935）是一位跨越晚清与五四，同时兼具作者—译者—出版者三重身份的文学活动家，因此，要探讨其作为译者的文化实践，尤其需要这样一种会通性的考察。

二、作为译者的曾朴

曾朴登上文坛，最初以其创作的小说《孽海花》名世，但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翻译活动亦占有相当分量。曾朴从 1895 年起即在同文馆特班开始法文学习，随后通过自学和在法居留多年的陈季同的启蒙，逐渐研读了法国及至欧洲他国的文学。1904 年，曾朴与同乡诸人创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小说出版机构——小说林社，他的《孽海花》也于次年在该社出版；由小说林社出版的《小说林》杂志，被认为是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当时亦获得广泛传播。在创办小说林社时期，曾朴不仅因《孽海花》的创作获得了文学上的声誉，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外语能力开始了译介实践，成为清末民初不多见的直接从原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者。1908 年，曾朴进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小说林社也于同年停办。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曾朴始终活跃于江苏省政坛，历任省议员、省财务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但在宦海生涯中，他仍坚持研读与翻译法国文学，曾译雨果（译名“噐俄”）小说《九十三年》（*Quatrevingt-treize*）及两部戏剧作品就发表于这一时期。1926 年，曾朴因与时任江苏省长的陈陶遗合力反对军阀孙传芳加收亩捐未果，愤而辞职，最终离开了仕途。1927 年，他与长子曾虚白在上海创办真美善书店并出版《真美善》文学杂志，重返文坛。他在杂志创刊号上声明，《真美善》“是主张改革文学的，不是替旧文学操选政或传宣的”^①，表达了自己接近并贡献于新文学的愿望。曾朴一生先后译介了大仲马、雨果、左拉、莫里哀、皮埃尔·路易等十几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雨果作品的持续译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中国读者了解雨果作品的主要资源之一。他所创办的两家出版机构——小说林社和真美善书店，其出版物中的文学翻译作品也占有极大比重。在 1927 至 1931 年开办真美善书店期间，曾朴除了翻译古典及当代法国作品外，还

^① 病夫：《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1 卷 1 号，1927 年 11 月。

同时撰写和翻译了有关法国文学史及法国当代文坛状况的文章;这一时期,他更有意识地把系统译介外国文学作为滋养本民族文学创造的源泉,辛勤著译,其所发表的译介法国文学的文字,数量上远超过他所发表的创作文字。因此,无论从对翻译活动的执著努力还是从其翻译成绩看,曾朴这位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都值得我们给予关注。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和鲁迅、周作人、巴金、冰心、李健吾、穆旦(查良铮)等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曾朴也在特定时代为传播与输入异国文学发出了他独特的声音。学界对上述作家—译者的研究侧重最能凸显其对“译者”的忽视。虽然作为其整体文学生涯的一部分,这些作家—译者的翻译活动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论者述及,但这种关注主要是作为作家生平研究的一部分,对其作为译者的文学实践本身,只是在近年来的翻译研究的视野之中才获得了比较集中和深入的关注^①。就曾朴而言,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虽然得到认可,但其翻译活动及其成绩则未能获得普遍了解。因此,本书希望集中考察作为翻译家的曾朴,在历史语境中理解其在特定时代的翻译实践,认识他在近现代文学史上作为译者的独特价值。曾朴身具译者—作者—出版者三重身份,其文学活动涉及文学的创作、输入、传播等各个环节,而他本人对异国文学的直接研读以及对译介活动的投入则保证了他的跨文化视野,并辐射到其文学活动的多重领域,使上述环节都带有与异域文化交流、对话的痕迹。在翻译活动这一最为核心的跨文化对话中,曾朴为自己确立了怎样的翻译目标?在不同时代,作为译者,他采用哪些策略在他者文化与本民族文化间进行沟通?他对域外文学资源的掌握如何影响到其创作和出版活动等等问题,都足以引起我们的研究兴趣。

另一方面,由于曾朴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界已具有的稳定地位与译介成绩,他在二三十年代加入新文学阵营的经历就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清末民初时就已享有文学声名的其他小说家,有的由于年寿所限,并未经历新文化运动后剧烈的语言与文化转型,有的则在新文化运动后成为与新文学阵营相对立的通俗文学作家,而曾朴却通过个人的选择与行动,最终被新文坛接纳。曾朴努力适应和参与文化转型的心态,与他本人对外国文学的直接接触和相对深入的理解有何关系?在其跨越晚清与五四的译

^① 宋炳辉的《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以作家翻译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可视为集中关注作家翻译的尝试。

介活动中又有怎样的表现?曾朴这种特殊的文化经历向我们提出了文化转型与跨文化对话的一系列问题。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曾朴去世后以“新旧文学交替时代这一道大桥梁”^①来评价他,显示出对曾朴独特的文坛位置的把握。曾朴的译介活动长达二十多年,表现出跟随时代不断调整与行进的特征,正因如此,通过自己的创作与翻译活动,曾朴经历并参与了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以此在这一历程中留下了独特的贡献与印记。他的文学活动折射出“近代传统文学与新文学运动之间错综复杂的焊接关系”^②,同时也多层次地反映出在跨文化交流的大语境中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轨迹。作为译者,曾朴长时间的翻译实践能够帮助我们透视文化转型时期译者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了解身处其中的译者逐渐接受异国文化的心路历程,也为我们理解清末民初直至新文化运动后蔚为大观的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因此,本书选择曾朴为研究对象,不仅希望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译者—出版者的法国文学译介活动及其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且希望借此辐射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跨文化交流问题。

三、关于曾朴研究的课题史及本书的研究方法

由于曾朴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涉及曾朴文学活动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多数集中于对其生平及创作的探讨。

知识界对曾朴的最初关注无疑缘于《孽海花》的成功。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了《孽海花》前二十回。次年,林纾就在其译著《红礁画桨录》的序言中对《孽海花》大加赞赏,并深以不知作者何人为憾。此后,曾朴这部作品吸引了批评者的持续关注,并最终奠定了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使任何近代文学史的写作者都无法忽视曾朴的名字。^③因此,学界对于曾朴的关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其小说创作《孽海花》,从小说出版至

① 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载《曾公孟朴纪念特辑》(该特辑是曾朴去世时印行的纪念文字合集,未署出版信息,应出版于1935年)。

② 时萌:《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载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15页。

③ 据阿英所言,文学史著作谈及晚清小说未提到《孽海花》的,只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8页)。胡适在这部著作中未论《孽海花》,主要缘于其对《孽海花》的偏见。关于胡适对《孽海花》的批评及曾朴对胡适批评《孽海花》的应答,请参阅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8—138页。